

P E R S P E C T I V E

视点

吴上余 主编

6

李宏图 选编

表象的叙述

——新社会文化史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象的叙述 / 李宏图、王加丰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视点”丛书 / 吴士余主编)

ISBN 7-5426-1851-2

. 表... . 李... . 文化史—研究—西方国家 . 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88870号

表象的叙述

选 编 / 李宏图 王加丰

责任编辑 / 刘宏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0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00千字

印 张 / 9.75

印 数 / 1—4100

ISBN 7-5426-1851-2

C · 47 定价: 20.00元

视点——策划人语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若说21世纪将是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不为过的。世界文化格局承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而重建新的架构，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趋势。它的一个显著效应将是世界人文资源的共享，人类文化在比较、融合、批判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因此，对话、交流、创新也将是21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的传统界阈将被冲破，学术文化的生态平衡将向现代形态倾斜和转变；学术思维的创造性和科学性，以及价值判断的认知理性与实践精神将更明显地

被凸现出来。

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一是对传统的、本土的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二是对人类文明的世界性考量。这是因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衍生了诸多新的人文现象和思潮需要去考量、追踪和研究。学术文化的发展不应停留在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诠释与总结上，而是要求学者能就新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新的现象、人文思潮作出迅速与理性的反应；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变革，并作出科学的应答。因此，文化交流、对话，广采博纳，审慎辨析，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以丰富自我，使中国学术文化多一些现代意识的内涵，就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以人文学出版为本位的上海三联书店理应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和繁荣服务。这也是我们在推出《三联评论》之后，酝酿和策划《视点》丛刊的初衷。前者意在为国内学界中坚和新锐提供学术创新的园地，后者则是介绍国外学界新的人文思潮和学术信息，为国内学人提供学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企望将《三联评论》及《视点》丛书作为上海三联学术著述出版的两翼，来反映中青年学者在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文化承传和创新方面的成果。

《视点》是不定期的丛刊，强调人文学术的主题性，即每辑确定一个专题，约请专家编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或辑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作综合性的评述，为求在某一学术专题方面能给读者有一个较完整的介绍。除了评介新的学术理念和信息，还将对不同文化价值判断的学术考量作理性的选择；为满足青年学子对国外学术文化的了解，还将对一些新的学术术语（包括跨语际的释义）作浅近的诠释。这些都将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需求提供服务，为国内学界的人文研究拓宽些学

术文化的思维空间。我们希望能跟踪当代国外学界的人文思潮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反映国外学者在这一课题上较高水准的成果。限于我们学识的肤浅，常常会留下种种遗憾。但对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去作不懈的努力和追求的。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在这方面，《视点》丛刊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的。在评介域外文化时，将清醒地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由学术理念和课题研究所涉及的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对此，《视点》丛刊将注意它对民族文化承传的负面影响；文化交流和对话也应对域外文化资源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与取舍；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不可否认，因编者学术素质的局限，在选编中难免会出现疏忽和偏差，但尽量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去对待域外人文学术研究，这应该是要努力做到的。

但有一点要强调的是，《视点》丛刊所译介的域外学术文化并非是为了照搬、效颦，也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我们的本意是为自身的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参照和比较。在抵御消蚀意识形态的“西化意识”的同时，积极审视、选择、吸纳有利于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建设的西方文明成果。笔者认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应包含着这种积极的出版意识。

吴士余

2001年4月

致 谢

李宏图

目前，在西方历史学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已经全面消退，历史学在与社会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结合中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走向了“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发展起了名为“新社会文化史”的新史学，并且成为了一种声势浩大的思潮与实践，在“新社会文化史”的旗帜下，历史学家已经重写了社会史，更加重视文化史，与此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性别史、阅读史、身体史、儿童史等。鉴于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新的历史学流派及其史学实践还缺乏系统与全面的介绍，因此，非常有必要引入这一新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提供参考。

在选编这一辑论文的过程中，要感谢很多学者和出版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分别是：帕特里克·乔伊斯教授、皮特·柯尔比博

士、汉娜·芭克博士、汤姆·克罗科博士、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的杰尼·登赫尔女士、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林达·尼科尔女士以及罗特里杰出版社等。

在文章的编选中，还应该感谢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加丰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许平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陈勇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沈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童世骏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彪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处的彭利平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周旭东副教授等，他们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参加了文章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当然，在此也要感谢正在就读的一批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们承担了很多文章的翻译工作。

最后，还应感谢上海三联书店的刘宏伟编辑，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目 录

1 / 李宏图 致谢

· 理论经纬 ·

1 / 李宏图 表象的历史——当代西方
新社会文化史概述

选编 / 李宏图
王加丰

11 / [法] 米歇尔·伏维尔 历史与表象

19 / [英] 帕特里克·乔伊斯 社会史终
结了吗

51 / [美] 诺曼·J·威尔逊 历史角色：理
性、性别、阶
级和话语结
构

75 / [美] 佩雷斯·扎戈林 历史学与后
现代主义的
再思考

· 对话平台 ·

95 / [英] 帕特里克·乔伊斯 从现代到

后现代：
当代西方
历史学的
新进展

115 / [美] 吉尔·戈德米洛等 纪录片的真实性有多少

133 / [法] 罗杰·夏蒂埃 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

· 文本解读 ·

139 / [美] 沃尔夫·坎斯特纳 寻找记忆中的意义：对集体记忆
研究一种方法论上的批评

167 / [美] 罗伯特·布朗 从大屠杀看表述的有关问题

177 / [美] 海登·怀特 历史情节的编织与真实性问题

183 / [英] 托尼·贝内特 文本、读者和语境

· 另类诠释 ·

189 / [法] 詹姆士·弥尔顿 公共空间中的妇女：启蒙运动时期
的沙龙

209 / [英] 皮特·柯尔比 英国童工和国家干预（1750—1870）

219 / [英] 汤姆·克罗科 睡眠训练：19世纪英国对沉睡中身体
的统治

· 性别理论 ·

227 / [美] 苏珊·斯坦福·弗雷德曼 制造历史：对女性主义、叙

述、需求的反思

235 / [英] 汉娜·芭克 18世纪英国的性别：地位、表象和责任

271 / [英] 玛格瑞特·桑普森 “婚姻的悲哀”：评近年来近代早期
英国和欧洲妇女、婚姻和家庭史
研究

· 关键词 ·

293 / 李宏图 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术语

表象的历史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概述

李宏图

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法国和美国等国家，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现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这种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他们认为现行的解释模式是根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其特征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历史研究，这种研究的主旨就是寻求历史的规律，并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以及历史学家要不偏不倚地解释历史，解释社会。于是，这些历史学家开始着手进行新的突破，他们在结构主义，特别是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的指导下，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象征、语言，研究人们在社会中所形成的“形象”，以及这些“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并且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们将此称之为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虽然“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80年代，但在美国，开辟这一转向的最早的代表性人物和著作则出现在

1973年。正是在这一年，有两本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转向的开始，尽管这些著作的重要意义在当时还未被完全发现。第一本是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怀特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在研究19世纪的历史编纂学或史学史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念，也正是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怀特确立起要去理解“历史表象的深层结构”。在这本书中，怀特把历史学的解释划定为四种不同的比喻、四种不同的情节、四种不同的论据和四种不同的观念指向的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历史解释的基本基础。同时，怀特还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次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即一种修辞战略已经预示于他所研究的领域之中，反过来，包括了运用“情节”等的解释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形成和塑造着历史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历史研究的主旨以及意图。这样，怀特的结论打破了以往的如实编排史料这样的历史解释范式和方法，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甚至语言模式的运用这一并非客观真实的研究方法。由于怀特更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由此，他也被视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

另一本著作是克利福德·格尔兹所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1973年，他把他从1957年到1972年所发表的关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文章结集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格尔兹写道，作为人类学家，重新定义“文化”一直是他的兴趣，同时，他也回顾了自己从早期的结构—功能主义到现在转向“符号学”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为本书的出版新增了一章内容，借以表达他对“文化”的最新理解。他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他说：“文化纯粹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它通过事件的分离，详细说明这些事件的内在关联，然后通过一般的方式赋予整个系统以一种特性——按照围绕它来进行组织的核心象征，一种有着外在表达的基本结构和所

建基于之上的观念原则来进行的”。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化是一种文本，即是可以描述的文本”。因此，研究文化的任务是用“符号学的方法”。既然文化是一种象征系统，格尔兹不仅研究了这些象征物的表达符号，如仪式、精神气质、观念、宗教，而且其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从艺术、宗教、科学、法律、道德到社会共识等。格尔兹的著作导致了文化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重新“格式化”，使文化研究从单纯的叙述转向解释和更细密的描述。此后，在这一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象征物、仪式、事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制造物、社会设置和信仰系统都被视作为符号结构得到研究，因为它们具有内在一致性，即都是意义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书中，格尔兹提出了其著名的格言：“和马克斯·韦伯一起相信，人是悬挂在他自己织成的意义之网的野兽，我把文化看成是这些网，所以分析它不像经验科学那样寻求法则，而是解释它寻求意义。”

追溯新社会文化史的起源，不能不提到法国历史学家所作出的直接贡献，正是通过一批法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努力，直接带来了日后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众所周知，在60年代的法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其重要的理论或“范式”为强调以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因此，这种历史有“总体史”之称。同样，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虽然如此，仍有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另辟蹊径，从事着文化史和其他一些新领域的研究，这就是被称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由于这一批历史学家逐渐从重视经济基础转向文化和心态史研究，这一转变被称之为“从地窖转向阁楼”，并且，这种研究后来迅速成为了法国等西方各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潮流。但平心而论，这些历史学家所进行的这种心态史研究实际上还未完全摆脱那种“结构史”的影响，这种心态

还并未成为独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仍然属于社会结构中的心态。正像英国历史学家乔伊斯教授所说，尽管这些著作显示出“文化主义的特征”（例如在E.P.汤普森的著作中），但他们还是把社会看作为结构，看作为一个鲜明的经验实体。尽管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相当重要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后来成为了新社会文化史的中心内容。同时，他们也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为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作好了准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新社会文化史兴起的第一阶段。

虽然新社会文化史已经初露端倪，但推动其走向前进的重要动力仍然来自于法国的一批思想家，特别是福柯的思想。早在70年代初期，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已经翻译成英文出版，但遗憾的是并未引起多少反响。直到1977年他的另外一本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形成》译成英文出版后，他的著作的价值才得到了学者们的重新发现，他的很多概念如“知识”、“谱系”和对很多问题的解释都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如罗杰·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等开始批判第三代的“心态史学”，反对把心态看成为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是按照经济、社会 and 心态来排列的第三层次。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全然就不是一个层次，并且心态也并不是由经济、社会所决定。实际上，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先于并且决定文化关系，相反，它们却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生产的领域。正因为此，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象征，它们只能在文化的实践中才能得到理解。所以，夏蒂埃响亮地提出，历史研究要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福朗索瓦·孚雷也认为，过去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式现在必须要改变，传

统的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历史事实，探寻历史规律，而历史事实只是按照时间的纬度来安排。现在，当历史学不再被看作仅是事件的排列，而是知识的创造时，要求出现新的叙事模式，要从客体变成为主体。他说，历史学家不仅已经放弃他们学科的主要形式——叙事——而且也放弃了最热衷的主题——政治。一种历史学的事实是心智的选择。历史是叙述的产儿，它并不是由研究的客体而是由所使用的话语类型所定义，去说历史研究时间正是以另一种方式指称历史研究是把所有的研究客体编排在既存的框架中：撰写历史就是讲述一个故事。

新社会文化史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带有这样鲜明的特征，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它改变着过去那种文化从属于社会和经济的理解，强调文化的独立。不仅如此，从事新社会文化史实践的历史学家们还认为，从此，文化不仅不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具有能动性，即反过来塑造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这就是说，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如新社会文化史经常提到的“仪式”、“象征物”等，当作为文化的“仪式”和“象征物”。在展开其自己的活动时，这种实践活动不再是单纯地体现和反映着社会，它们自身也在独立地发挥作用，创造并再生产着社会。这就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强调的主题，社会的意义是在语言和文化中被表达和建构的。因此，从事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都共同强调或突出这样一些概念，诸如“形象”（Image）、“表象”（Representation）、“实践”（Practice）、“发明”（Invention）等。由此可知，与过去传统的历史学相比，这的确是一种“颠覆性”的反转，它彻底打破了过去那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式的排列，降低了社会、经济这种实体性要素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文化的能动性。我们看到，

一批历史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新的历史学实践。

长期以来，阶级一直是社会史领域所探讨的重点，而对阶级的理解也一直是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进入80年代后，英国的历史学家在“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开始批评汤普森的观点，并且开始质疑社会史中的“社会”的概念，认为，以前社会史所研究的“社会”是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概念，而现在它必须要与后现代性相联结。正因为此，本书所选择的“社会史终结了吗”一文就鲜明地表明了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历史学家关注通常被我们称为“另类”的历史内容，如儿童史、沙龙与公共空间等，本书的这两篇文章将帮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新动向。

历史学家们不仅在社会史领域进行着新的实践，与此同时，他们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引导下，还奋力开拓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更加注重文化史、阅读史、性别史和身体史等。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带动了妇女史研究的兴起。80年代后，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妇女史演变成为了“性别史”。在这里，有必要对这样两个概念作出区别，而这种区别则完全体现着传统史学和新文化社会史之间的差异。新文化社会史学家一致认为，“性”（Sex）指的是生物学的概念，体现着人的自然特性；而“性别”（Gender）则指两性之间的差异不再仅是由生物特性所决定，而是为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建构的。汉娜·芭克说：两性间的差异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文化、阶级和种族间的一种社会的建构。所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被重新定义。因此，两性之间的差异并非是根植于生物差异的基础之上，而是社会的产物；同时，在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两性间的差异是变化的。这样，“性别”与“性”这两个概念就有着不同的意义，“性

别”是一种意义体系，也是一种关系体系。它作为一个核心的概念，指在不同性别的关系中分析女性，即在差异中研究差异。同时把“性差别”与社会文化连接在一起。由此，与妇女史所不同的是，“性别史”侧重于探讨关于性差别的形成以及这种差别的社会文化知识是如何生产和传播的，同时研究性、性特征、同性恋，特别是女性同性恋以及这些观念的历史演进。此后，“性别史”取代了妇女史成为了探讨性别差异产生和不断变化的方式的重要分析工具。本书中的一组文章就反映了当前“性别史”研究的最新动向。

深受福柯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规训与惩罚》一书的示范，历史学家开拓出了身体史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当代社会所出现的很多新情况如文身、美容、性解放、艾滋病、同性恋也向古老的历史学提出了召唤，促使着历史学家从事身体史的研究。在研究中，历史学家借用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认为身体不仅是自然的形状，而是一种可被别人察看的存在，它反映、体现人们的关于现实世界的价值体系，如对身体的胖和瘦、美与丑等的评说无不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因此，历史学家开始研究身体的表象。还有一些学者研究睡眠，通过对睡眠时间刻度或规训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辨识出社会权力的结构。本书中的关于睡眠的这篇文章将给我们以启迪。

新社会文化史出现之后，它以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在历史学领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对现行的历史学提出了挑战，动摇着历史学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挑战表现在：第一，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历史的事实是什么，历史学家能否获得真实的历史，能否达到真理？新社会文化史学家认为，“事实”是具有意义的，但它仅是在叙述中而有其意义，并且，这种意义因叙述者所使用的不同的情节和话语而产生不同。因此，事实和真理是通